

## 作为寓言的掩耳盗铃与戏剧学学科设定

周云龙

作者赐稿

—

### 戏剧研究网学术研讨会杂谈（三）

“掩耳盗铃”的故事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大部分接受过教育的人在童年可能都嘲笑过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并获得了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掩耳盗铃”提供的教训却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很少人把留心到其训谕层面的意义，而是把它当成一个低级笑话来读。因为只要是能读懂这则故事人，都不会像那个盗铃者那样傻到那个地步。其实，未必！

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和批评：戏剧研究网创办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两个拟定的论题颇为醒目：“如何建构中国的戏剧理论”和“如何评价西方戏剧理论对传统戏曲的阐释”。这两个论题本身都是超级宏大的、可以用几本书来探讨的问题，本文不打算自讨没趣地承受这一不堪之重，而是想谈谈这两个问题提出的本身所涵寓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涉及到了戏剧学学科的立论基础。在本文看来，这里不啻再度上演了一个“掩耳盗铃”的故事。

在某种意义上，“如何建构中国的戏剧理论”和“如何评价西方戏剧理论对传统戏曲的阐释”的提出，真正关涉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戏剧理论与民族文化的边界是否应该重合？提出这两个问题的人，内心的焦虑与不甘在在可见，或者说他/她潜在地已经表达了对于“西方戏剧理论”入侵的不满，认为“戏剧理论”亦可作为一个民族的客观属性，就像语言、种族一样。否则，又何来“中国的戏剧理论”与“西方的戏剧理论”这些标签呢？这两个问题提得轻松，却落得严重——这种内在的逻辑为民族隔离贡献了一份话语力量。在传统的戏剧学学科设置上，常常会有各种暧昧的、未经任何检讨的分支，比如“中国戏剧理论”、“西方戏剧理论”等等。那么，本文要追问的是，这一学科的“身份”预设的依据是什么？是语言吗？还是理论提出者的族裔？如果是此类标准，那么本文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其中的悖谬。显然，这里的“中国”与“西方”只不过是一种建构。很多时候，所谓“中国的戏剧理论”常常被置换

为“中国古代的戏剧理论”，好像晚清以降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声音，“中国”的身份只能在辉煌的古代才能找到。显而易见，“如何建构中国的戏剧理论”和“如何评价西方戏剧理论对传统戏曲的阐释”的提出带有一种对抗理论殖民的悲壮心态，然而，这里意欲建构的“中国戏剧理论”沿用的依然是理论殖民的逻辑。甚至这里使用的“中国”就是“西方”的发明，因为“中国”在这一表述逻辑中是静止的、没有时间的。就像前一段那本很轰动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一样，其中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含糊不清，“不高兴”就没有意义。

全球进程势不可挡，中西方戏剧交流的历史也已将近三百年，早已无法区分什么是“中”，什么是“西”。即使被视为血脉纯正的古代戏剧理论里面也存在大量的异域戏剧文化，古人尚有全球胸怀，今人何必在这里斤斤计较。在影片《叶问》里面，金山找与叶问比武失败，气急败坏地说，北方拳输给南方拳了，叶问平静地说，不是南北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不同的戏剧文化汇流之后，欲从中辨析出其确切的族裔身份，无疑将是徒劳，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心态上的偏狭。事实一再证明，戏剧理论的族裔身份丝毫不会影响其阐释的有效性，因此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就是异想天开。从其根源上分析，这是特定式时代经济腾飞导致的文化心态膨胀与传统的学科规训互动的后果。

铃声不会因为捂住耳朵就传不出来，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戏剧思想亦然。